

然而因为所走的人生道路大致相似，六十年来又在同一片天空下，读她青年以后的回忆，各个时期的心路几乎是相互印证的。只有她在云南路南县小城里的童年，才有隔世之感。

她对童年的追忆，《铙铃声》、《誓雪国耻》以及《我没见过面的姑母》、《我的第一个女教师》诸文，原有一个总题《远方的童年》，前面有段小引，发表时不知为什么删除了，我看过原稿，觉得删去的几句也很引人深思：

我生长在遥远的边疆小县……可是我小时候，在那个小小县里，到过北京的人屈指可数。那时我所见过北京的东西，只有我舅母手上戴的那个“京顶针”，所以我觉得它远在天边，我一辈子也不可能去经历那传奇式的旅程。

一个女孩子，在歧视妇女的社会里，不会有快乐的童年，所以凡是我那小县女孩子所能遭到的不幸，对我也都毫无例外；不同的是，我不甘屈从命运的安排，因此，我比她们遭到的压迫就更多。可是我并不抱怨我黯淡的童年，如果我没有经历挫折和痛苦，我的身边尽是鲜花，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。

我不想提那些，我要从灰黯童年的生活泥土中，刨取几枚稍具光泽的石头，献给亲爱的读者。

李纳这“暮年赋诗”，实际上也就是依着她这个

乡的撒尼大爹等等的人与事。因为有高原反应，故乡不能归，纸上的梦游，说的也是八十多年前，是朱自清先生感伤他父亲之《背影》时的景象。对于已迅速现代化的城市，它也应该是“兼具了‘史’的品格”的路南档案。

这里编辑的，正是她这些有关路南的，以及记述乡情的短章。诗人邵燕祥以诗笔所写的前言。不限于这里选进的这些文本，以更开阔的视野，对作家的作品有个整体的评述，对作家人品的介绍，有助于读者走进这些作品的阅读。

2010.4.1，乡居

深的性格，说得小朋友们都围拢来，我越说越高兴：“……鲁智深一步一步抢上山来。只见庙门已经关了，他使用碗大的拳头擂鼓似的敲门，哪个敢开？那鲁智深回头一看。门前站着两个大汉，他大叫：‘你这两个鸟汉子不开门，还来吓老子！’捡起一根木棍，劈头盖脸朝那哼哈二将打将下去，只听得哗啦一声……”

孩子们都听得入迷了，眼睛跟着我的手势转动，不料走来一个人，头发剪得和男孩一般短，她用食指在脸上羞我：“羞羞羞，讲错罗！”我也不肯让人：“哪里讲错！”小朋友们讨厌她打断我，推她走开。这一推，使她很生气，越发大声嚷：“鲁智深打的是金刚，不是哼哈。”

我说：“是哼哈，我姑母讲的。”

她说：“你姑母就不知道，不信，我们一同去问茶馆里说书的去。”她一把拉住我。

我甩开她的手说：“我不去！你不看见两门外的大觉寺，南门外的普贤寺门口站的都是哼哈，哪有金刚？我姑母不会讲错的！”

她说：“就错！”

我说：“就不错！”

“就错！”“就不错！”……

我们两个你推我一下，我掀你一掌，她咬人是出名的。她咬了我一口，我也狠狠地推她一把，她退到楼梯口，把不住，一跤跌到楼下去了。

“给我，给我，”我伸手去抢。

他假意高高地举起，被我跳起来一把就抢到手。原来是个小烟盒，扁平形，黄杨木做的，烟盒下面吊着丁丁当当的一串小玩意，盒身刻着一位撒尼青年，粗犷的刀法把这个人刻得非常生动。这个人背起弓箭，面对着我，就像有很多很多话要对我讲。我入迷地看着那个人，越看越感到他就要跳出来。我问高大爹：“这人是哪个？”

“是我们撒尼的英雄，”高大爹说着，脸上闪过一道光亮。

“他这阵在哪里？”我追着问。

“就在我们寨子外头。”

“他在那里作哪样？”

“他舍不得和我们分开。”

“天天都站在那里吗？”我越发惊奇地望着他。

“白天晚上，刮风下雨，他都不走开一步。”

“为哪样不拉人家进家里歇歇？”我心里挺怨高大爹他们太狠心。

“就是开几十万人去也拉不动他，他的身子方圆有几十里。”

“他为哪样长得那样大？你和我讲，讲嘛，讲嘛。”我央求他，扳住他的大拇指。

高大爹被我缠不过，漆黑的眼睛看定我，样子变得很严肃：“好多好多年以前，我们寨子里有个小伙子，从灵山找来一棵松树。他听一个白胡子老倌讲，

月 琴

元宵节刚过，我借宿在一个撒尼寨里，它的名字叫“紫竹箐”。你无法想象在丛山峻岭中，会出现这样美丽的村寨：一塘清汪汪的水如同昆明天空一样明亮、清爽，水塘四周用紫竹镶边，老远望去，好像挺直的姑娘，手携手地围住水塘，不知是欣赏这颗明珠呢，还是深恐它忽地飞走？

我到这个寨子前，县上派一位撒尼族青年小金伴送我。小金就是紫竹箐的住户。他聪明漂亮，是位出色的诗人和歌手，对于自己的民族，有一种狂热的自尊心。他还是一位勇敢机灵的射手。有一回，我们一同出猎，刚升起篝火，一只麂子从草棵中蹦出来，活像一团火，我的“啊”字尚未落音，小金却闪电似地举起石块，一转眼，麂子被击中，倒在草棵里。那时，我们快乐地享受了一顿丰盛的麂子宴。

寨子里有一所高大的法国教堂，如今成为儿童受教育的小学校，我和小金就借住在这座教堂的侧屋里。今天他才告诉我，他将和一位撒尼族姑娘举行婚礼。按照姑娘的意愿，婚礼不采用撒尼族人的繁琐传统，而以简单的方式进行。

唉，一定是我的！我看弹琴的人摇头晃脑，被浓烟和酒味熏得好像醉了，这时，正在弹《小放牛》，轻快、活泼，就像从山上淌下的泉水。有的年轻人索性点头磕脑地跟着哼哼：

天上梭罗什么栽？

地下黄河什么人开？

……

这个人弹完，从烟雾腾腾中传出掌声，叫好声和跺脚声，我恨不得一把将琴拿到手，顾不得人家愿意不愿意，闯上前去，向弹琴的翘起大拇指，恳切地说：“大哥，我也爱弹琴，听你弹，我不由地手发痒，大哥，你也弹累啦，借我弹一下……”那汉子起初一怔，有点怪我冒失。人群中喊的喊，叫的叫，有的捶桌子，有的大声嘲笑。忽然有个年纪大的人喊：“老哥，就请这位外乡朋友弹一曲吧，你们换换手。”这人的话刚歇音，大伙就跟着喊，“对，老哥歇歇手，外乡朋友，你弹个《玉美琴》吧！”有人喊，“弹个茶馆小调吧！”还有人喊这喊那，催着我快弹，快弹！我调了一下音，分明就是我的月琴，我的宝贝！我兴高采烈地弹了一曲“茶馆小调”，人群中响起山崩地裂的声音，凳子倒地声，掌声，响成一片。有人喊：“弹个《矿工苦》吧！”我弹完，喊“好”的声音差一点震倒房屋。矿工的情绪激昂，有人嗓子喊哑了，

誓雪国耻

好像我还很小，就听家人说：中国原来是个强盛的国家，号称文明古国”，近百年来，因为满清腐败，割地赔款。家人称这些为“国耻”。后来又听祖父讲：“安南人^①真可怜，法国人上下马，都要他们趴在地下，将脊背给法国人当马蹬。”祖父说完上一段话，总是叹口气说：“亡国奴是当不得的！”

我“逃难”到昆明，住在会馆里，这条街正是越南人汇集的地方。早上，听到的是“梯他、梯他”的木屐声，嘴里喊着“卖洋粑粑喽”。所谓“洋粑粑”，就是面包。

这些安南人，不分冬夏，都穿深咖啡色的衣服，长及膝盖。虽是寒冬，也不穿棉衣，不穿鞋袜。有的跟在法国人后面，在火车上检票；有的就在火车站附近卖煮鸡蛋。他们不分男女，经常口嚼槟榔，牙齿都变成黑色。“贫穷”是他们的另一名字。想起祖父常叹息的“亡国奴的苦是受不尽的！”我心中格外难过。

1931年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“九一八”事变，一

^①安南人：即越南人。越南原名安南，1802年改国号为越南，自1884年沦为法国保护国。我国民间仍沿称其为安南。

这是一个富于生气的黄昏，晚霞照红了一切，我宛如看到巨幅生动的油画。我相信，艺术家会在这儿捕捉到称心的镜头；诗人会在这儿获得灵感。而我，只想和年轻人一同奔跑……

我找到路边的最高处，站立着极目瞭望，似见一条条公路在天底下延伸，通向四面八方。这时候，我忆起两天前和县委宣传部金玠同志登上人大常委的屋顶，金玠同志向我指点路南的山脉河流，指给我蜘蛛网似的公路。金玠同志热情地告诉我“现住，我县的公路，已通到各个村寨。”

我顺着金玠同志指向的地方眺望，只见公路纵横交错，几只洁白的鸽子，正冲向蓝天白云，那时，我的感情也和现在一样奔放。

迎着往来疾驶的车辆，我不禁从肺腑里喊：“故乡，我的母亲，你的路多么宽广啊！”

一个可怕的人。他们常告诫小辈：“莫惹这份穷人！”大人多半不喜欢他，更不希望孩子辈接近他。但孩子们偏偏围住他，哪怕挨打也没有悔过之意。

1934年，听说红军要从我家乡经过，有钱人惊慌失措，收拾细软准备逃走。还放出谣言说：“红军一来，抽筋剥皮，见人就杀……”这个汉子并不害怕。在最慌乱的时刻，他忽然奔向圭山。圭山是撒尼人居住的地方，重义尚武，家家有枪，在解放战争中，首先举起反蒋的大旗。究竟他去干什么，至今对我仍是个谜。

我的另一个堂伯母不识字，眼睛患严重的白内障，睫毛成排内倒，经常要拔，有时来不及拔，便用小竹棍夹住上眼皮。她是个聪明能干的女人，当嫁到婆家时，发现丈夫又矮又瘦，软弱老实，很懊丧，一定督着丈夫发奋读书。十八九岁的男子汉，还读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，成为妯娌间的笑料。后来三伯父果然识几个字，能写账，能看懂民间的小唱本。他舌头大，咬字不清，读唱本时，将“盘古”念成“盘堵”，引得听的人常常打趣三大妈。

在她的指挥下，丈夫开了个小铺。每逢乡下赶街的日子，便挑点黄烟和雪花膏之类去卖，往往到夜深才能回来。三大妈就照料铺子，将整包烟打开，分包成小包，从中赚点钱，实在有限得很。

她铺中东西少，顾客不多，自己又差不多双目失明。她怕风，常年头顶“兜头”站在铺子里，做不了

样的图书馆，这次看到海洋一般的书籍，感到很激动。附中借用的是路南的文庙，文庙建筑宏伟，是路南人的骄傲，图书馆占用文庙的大殿，各种图书堆满了大殿，必须分类整理上架，才能开馆出借。我一个人整理不过来，学校派几个学生帮忙。我读书不多，许多书拿不定如何分类。这几个学生果然出手不凡，手脚麻利，教了我很多知识。凡是进步的书，扉页内都打上“郑一斋先生捐赠”字样。我问同学姓郑的先生是何等样人，同学告诉我，这是一个思想进步的先生。不但给附中捐书，昆明好几个学校都接受了他的捐赠。

附中学生，的确功课很好，能言善辩，多才多艺。通过借书，我和一部分进步同学熟识起来，我和他们一同唱歌，演戏。我们唱的都是救亡歌曲，其中大半是延安流行的，也唱苏联歌曲。他们都向往延安，把延安奉为灯塔。讲述延安时都带着欣喜与骄傲，犹如讲自己的家一般亲切，“到延安去”成为最动人的信念。这些常常深深地震撼了我的灵魂。

有一天，姨父将一本《西行漫记》交给我。这本书读得我如痴如醉，一个理想的天地，具体地展现在我面前：“一个人就应该像他们一样地活着。个人的幸与不幸，摆在它的面前，实在太渺小了！”

我变了，变得心胸开朗，眼前常常涌现一个多彩的世界，我愿为这个世界而献身。

图书馆不但有丰富的书籍，还有许多进步的报刊。有一天，我看到一本画报上刊登一幅在延河洗衣的女

不定，好像将大祸临头。我从未见过母亲这模样，忍不住掉下眼泪，她也抱着我大哭：我的心肝，我害了你了，他们把你的稿子抄走了，不知会怎样整你啊……

1967年，我北京的家被军宣队占领，逐到东郊的两间小屋里。朱丹仍被囚禁。我在安徽进了牛棚。儿子遭株连，也被囚。母亲孤零零地守着两间空落落的小屋，抵御法西斯式的抄家，街道的盘查；邻居的歧视。每日站在阳台上，等待亲人的归来。这样的日子过了漫长的一年，终不见亲人的踪影。

我获得“解放”已经到1969年。头一件事就是请假回家探母。家中被抄得翻了个儿，像被一群野马蹂躏过。我决定将母亲接去安徽与我同住，她欣然愿往。这时，我下放淮南煤矿。淮南煤矿分给安徽文联下放干部一栋日式小房，我分了一间，很小，除一张床外，只够放一条桌。我在煤矿给矿工发矿灯。这工作需要眼力和手劲，我两者都不济，做起来很吃力。但我宁愿一辈子在这里。这里没有批斗，没有咒骂。母亲又为我营造了一个“安乐窝”。说也奇怪，我们身在煤矿，却没煤烧饭。我到山上拉些树疙瘩，母亲居然拿树疙瘩燃起了火，做美味的饼干。每天她早早起床，在煤油炉上把头晚上泡好的米煮成饭，上面放根香肠，等我起床，饭都已做好。我顶着星光踏着碎石上班。中午打开母亲给做的香肠和饭，有滋有味地吃着。下午四五点，带着满身疲劳和灰尘回家，迎来

迟 悼

欧根同志辞世多年，很欣喜要为他出版纪念文集。欧根同志把宝贵的一生奉献给人类最壮丽的事业，历尽艰辛，虽九死而未悔，多么值得载入史册。

抗日战争进入白热化的 1938 年，日寇占领了大半个中国，昆明，当时的大后方，当然遭到日寇的轰炸，居无宁日，庞大的昆明已不容许摆上宁静的书桌，于是学校纷纷疏散到乡下。这时，云南大学附属中学便疏散到小县路南。附中的教导主任杨一波是路南人，早年留学于莫斯科中山大学，他与主任杨春洲先生珠联璧合，把附中办得有声有色，光彩夺目，赢得“红色中学”的美誉。这个学校培养出大批品学兼优而又具有先进思想的学生，欧根同志便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附中分高、初中二部。欧根同志是高二班的学生，他很有名，一切救亡活动都看得到他的身影，在他周围团结着大批优秀的学生群。从这时起，他就在我心目中打下深刻的烙印，我尊敬他，把他看成我的学长。

附中师生爱唱延安的歌，爱演延安的戏，爱读延安流行的书。延安是师生心灵深处的净土。陕公，抗大好像是他们血肉相连的家。奔赴延安是他们最美好

掉了！

但陆良也免不了历史上灾难的年代，当成批好干部受难的时候，老登高也被强行定“罪”，受尽了摧残，到了黑暗的1971年，他与世长辞了！

他的逝世，震撼全县人民的心，尽管冬云笼罩上空，人们连吹口大气也会成为“罪犯”，但在埋葬他那天，没有人组织，没有人呼唤，全县四十万人中竟有十万人为他送葬。在送葬的行列里，有手拿香烛的老奶奶；有白发苍苍的老者；有抱着孩子的母亲……在无声的中国土地上，点燃起响彻云霄的鞭炮，三十里长的送葬路上，鞭炮声没有间断过。

鞭炮代替人民的怒吼，鞭炮显示了人民的力量，是悼念，也是示威！

人民将他葬在全县最高的龙凤寺，让他永远面对着陆良坝！

……

我多么想去拜谒这位好党员的墓地，向他表示我真诚的敬意，但我们很快就得起程，时间来不及了。我只能顺着热闹的北门街往前走，向本地人请教龙凤寺的所在地。我站立街头，面对隐藏在白云下的龙凤寺，长久的仰视着，将一片敬慕之忧投向我无缘拜见的同志。从我身边涌过的是无数穿红着绿的男女，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位干部的描绘：“以前的陆良，女人都穿黑衣服，黑裤子，头上缠一块黑布，老远望去，分不清是男是女？是老是少？”此时此刻，我竟找不出一身穿黑的人，